

· 蜻蜓丛书 ·



郑天一
●
主 编

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正处于变迁中。对于文化的形式、凝合的特点、文化的变迁及对文化走向的把握作出科学的解释，是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蜻蜓丛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该丛书借助蜻蜓的复眼，以其360°的广阔视野，对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和思考，力图从中探讨其规律性，以便给人以启示和帮助。

郑晓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蜻蜓丛书·



郑天一 ● 主编

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

郑晓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 / 郑晓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004 - 7947 - 5

I. 社… II. 郑… III. 社会资本 - 关系 - 民族地区 - 农村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32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743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许多东西，当你拥有的时候，不感到它们的存在；而当失去它们后，才感到它们是多么重要，比如健康，比如幸福，比如安宁。

郑晓云这本书让我再次深切体悟了这个道理。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宁静和谐广为人知，令人向往。而今，这却成了回忆。无规制的市场化如野马践踏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污染着这里纯净的天空。今昔的反差，使你深切怀念失去的温馨安宁，并且不由得要追问：这是怎么了？郑晓云的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困扰作者多年的问题

少数民族社会近年来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产生的种种负面现象，使每一个深切关怀他们的人内心难以平静。他们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一变化？我知道，这些问题同样萦绕在作者脑海里，前后有十多年了。它们构成了作者探索的动力，最后促成这本书的诞生：他太爱这片土地了，对逝去美好事物的痛惜，促使他用探询的目光观察这一现象，寻求对它的解释，努力猜测其隐含的“密码”，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与作者相识 20 多年了，大概知道他的学术心路。大略说来，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欣喜，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后，伴随着少数民族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他对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忧虑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尤其对那里社会纽带的断裂、淳朴民风的改变、自然资源的流失和环境的破坏倍感痛心。这使他最初的忧虑变成了焦虑。这些年来，每次和他交谈，他都是忧心忡忡：发展难道需要少数民族社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我知道，他内心一直在渴求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并且试图提出建议来改变这一局面。可以说，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他已经酝酿多年了。

社会资本：打开了理论之窗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社会资本理论的引入，为作者打开了理论之窗。

社会资本属于 20 世纪后半段出现的新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之列，指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非经济资源。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对于经济活动何以能够正常进行、社会何以能够正常运行的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用于发展研究，它关注的是发展的非经济维度，非物质性事物。社会资本的定义有多种，被视为经典的是罗伯特·D. 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可以被视为社会组织的种种特征，诸如信任、规范、网络，它可以通过促进行为的协调而提高社会效率”。^① 这一定义到了作者那里，犹如一种解码工具，使他豁然开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的性质有了一个共同的归属：社会资本。可以

^① 作者依据社会资本的多种定义，在本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的定义与普特南的定义略有不同。

说，社会资本理论给了他解释上述现象的有力工具。他用这一理论阐释少数民族社会曾经的和谐，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将其症结归结为社会资本的流失。

社会资本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他们面对的是发达国家个人主义化的社会如何积累社会资本的问题。非常有价值的是，作者使用这一理论，从人们社会组织、社会网络、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的存在状况，提出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社会资本流失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重构社会资本的命题。他主张，我们既要重视长期历史形成的既有的社会资本要素，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之注入新的元素。这本书为我们论述了以西双版纳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社会在迅速市场化大潮下的巨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描述当代少数民族社会变化的论著甚多，而由于使用了新的理论工具，它将平时容易被人忽略的种种现象搜集梳理，变成一种有结构的知识，并进而揭示其内涵。这是一种科学研究意义上的知识处理过程，因而所论给人的启迪多多。

探索的价值：两个“第一次”

作者的这一探索在理论上、认识上和实践上均具有可贵的价值。

首先，他为社会资本研究增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宝贵的经验材料，从而有助于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者第一次使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第一次提出了少数民族社会资本流失及重构的

问题，意义重大。社会资本这个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社会经验现象的研究浪潮，其中，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居民社会网络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作者首次以社会资本理论的工具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状况，为社会资本研究增加了宝贵的经验材料。我们知道，含有新质的经验材料是新理论发展乃至突破的基础，东南亚现代化现象所证明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大大推进现代化理论的更新就是一例。因此，毋庸置疑，作者的探索将有助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该书的理论意义。

其次，该书揭示的“现代性的后果”足以警示世人。该书进一步颠覆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浪漫想象，提示我们关注现代化的代价。

现代性、高增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有人开始敲响警钟。罗马俱乐部 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从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角度，对无节制的增长发出警告，人们开始关注发展的代价。近年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德国的贝克和英国的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都足以使人警醒。其中，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中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现代性的“黑暗面”，甚至把现代性视为难以驾驭的“猛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自我毁灭的道路，使人难忘。^①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3、145 页。

西双版纳过去是令人向往的天堂。美丽的热带风景，村民温饱无忧，纯朴的民风，温和的性格，和谐的社会，可以说，它集中了农业文明所有美好的因素。直到知青下乡的40年前，那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夜不闭户。对此，作者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给予了生动的描述。那是个社会资本丰富的地方。而只经过了短短的30多年，这一切似乎都被颠覆了，社会资本大量流失。其变化的剧烈，反差的巨大，使人好像穿过了时间隧道。它将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尖锐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令人震撼，使人警醒。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GDP崇拜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可以说是该书的认识意义。

最后，该书提出了社会保护的命题。面对少数民族社会的社会资本大量流失的现象，作者提出了重构社会资本的问题。进而言之，在发展的背景下，他是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社会资本变化的知识汇入波拉尼“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理论脉络之中。换句话说，这是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中国少数民族版”。

“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理论是卡尔·波拉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的。这本由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之撰写前言的著作，^①深刻论述了市场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他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双向运动支配的：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它所遭遇的反向运

^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前言中说，能够为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动。这种反向运动是保护社会的运动，旨在将市场的扩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他说，市场机制具有摧毁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果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的主宰，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波拉尼尖锐地指出：市场“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基于这一分析，他提出了“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著名理论。^① 本书所论述的少数民族社会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冲击下的节节溃败，再次印证了卡尔·波拉尼的论断。

作者从重构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保护社会的命题。

我特别关注本书描绘的西双版纳橄榄坝地区傣族园建成前后变化的内容。它向我们生动展示了社会资本在这里的存在和近年来的流失。传统的现代转型是所有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急剧的发展变化、社会机制来不及回应、传统来不及转型就被抛弃所导致的创伤。这表现在社区和人的两个层面。

传统傣族社区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和内聚力的地方共同体。这里几乎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田园牧歌式农村生活的所有浪漫想象。人们遵循着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原则，经济活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自从在这样的社区内（请注意，不是在这个社区之外：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建立了商业性的傣族园，这个社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化

^① 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0、63 页。

彻底击溃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规范和价值体系，社区社会资本的迅速流失无可避免：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商业竞争导致了邻里关系恶化，社区凝聚力解体。在人的层面，青年人精神空虚，赌博、酗酒、斗殴。这是因为，原有的社会组织解体，社会资本流失，逐利动机取代了生计动机。

生计动机和逐利动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动机。从亚里士多德到波拉尼，都对二者做了严格区分，指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波拉尼甚至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为逐利而生产的行为是违反人的本性的论断是“击中了要害”。^① 生计动机是与斯科特的小农生存伦理相匹配的；逐利动机产生的行为则是市场行为。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之下，人本身不再是目的，他人、社区公共品，公共资源，都物化为追逐利润的手段，传统社区一下子市场化。我们在本书看到，在逐利动机下，橄榄坝千百年来傣族社会为人称颂的美好传统被彻底颠覆。

作者实际上是在用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知识加入关于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清楚的事实逻辑：“市场化冲击——少数民族社会资本流失”以及作者期望的发展逻辑：“致力于社会资本重构——社会保护运动。”由于丰富的人类学知识，他的思考在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理论的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这些讨论表明了他研究的政策含义。

简而言之，本书有两个“第一次”：第一次使用社会资

^① 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本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当代少数民族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第一次提出了少数民族社会资本流失及其重构的问题。尽管书中有的地方还有待完善，但是，由于这两个“第一次”，我深信，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会在日后逐渐凸显，它在分析方法上的贡献将会给后来人以有益的理论滋养。

最后，一个问题仍然在我心中翻腾：那富于诗意的西双版纳还会再现吗？现在，我不忍心再次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因为，我害怕对它多年前美好的记忆被玷污。

孟宪范

2008年10月于北京

自序

—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制度、价值取向、生存机制等要素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目前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同时在人力资本建设、经济发展、行政管理、资源管理、政府制度创新、社区建设、农村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是有社会属性并且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直接关系的。不同的国家、政府、机构和组织，不同的民族背景之下的人群，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社区都会存在不同的社会资本。同时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政府层面的、民间层面的社会资本。政府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组织网络以及为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等，民间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是产生于一个地区、一个诸如不同民族背景的人群、一种民间组织之中的相应社会资本构成要素。本书所要论述的是少数民族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与发展之间的关

系，借此来探讨社会资本在中国这样有不同的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农村发展中的意义。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社会资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社会中的意义得到了阐释，并且在社会资本的建设中考虑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那么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与运用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境内有 55 个法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乡村社会中，同时居住区域大多数位于中国西部以及西部的边疆地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都具有特定的社会资本。针对一个民族而言，由于社会资本是产生于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环境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民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发展中能够促使人们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动力与润滑剂。研究表明在发展过程中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激活基层发展的动力，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去实现发展的目标。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资本。在少数民族当代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够为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提供生存和发展必要以及足够量的公共产品，需要特定的社会具有生产一定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另一方面当代发展的过程对社会资本产生着越来越大的需要。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与民族发展来说都有普遍的意义，这已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

本书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是放在当代发展环境下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时期，在这种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更能看出社会资本对于

发展的意义。在中国，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群体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和汉民族相比在人口上的比例及文化上的非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格局。和汉族相比较少数民族是一个单独的族群概念，少数民族社会由于民族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在当代发展中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是与汉民族发展中的差别，另一个层面则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在当代的发展中，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少数民族的发展和主体民族的发展之间有差距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发展上。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边疆、封闭的欠发达地区。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以及全国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环境、制度环境等方面都可能表现出和其他地方更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少数民族自身在发展中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包括民族文化的流失、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不良社会现象出现、生态环境恶化、发展能力下降等问题，这往往成为一种发展中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与发达民族、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可能导致自我发展能力的下降，甚至存在着和传统社会相比较的倒退现象。因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格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少数民族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解决好这个群体的发展问题，实现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

如果说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相比较在发展上的一些差距是客观存在，那么在发展中少数民族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就值

得特别关注。缩小不同民族发展之间的差距需要国家的努力，也需要各民族共同努力，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建设在当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来说，在其长期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都已经形成了社会控制、社会生存、发展的相关规范和机制，形成了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支撑着不同民族社会的运行，这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资本。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各民族都需要拥有社会资本去支撑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但是当代的发展现实中，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形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形成一定模式的社会体系的瓦解，事实上也就是对各民族传统社会资本的侵蚀，使得各民族的传统社会资本瓦解、流失。这种事实在中国也没能避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对社会传统的冲击主要是来自于政治运动，而 80 年代以后的冲击则是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经济体制变革与当代的全球化影响，二者都导致了明显的传统社会的瓦解，而後者的影响则更为深刻。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就已指出，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毁灭传统的社会制度，包括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信仰关系在内的非契约关系，使传统社会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市场经济意味着被它卷入其中的社会制度不得不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要求。它将人们既有的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信仰的组织联系分离开来。在市场经济面前，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机制、规范甚至伦理道

德可能都是与之冲突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必然要摧毁这一切^①。事实上，今天我们的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很多现象仍然没有摆脱卡尔·波兰尼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预言。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很多制度、规范、价值等都被破坏了，因为这些要素中的很多内容可能与市场经济是冲突的。

在当代我们可以观察到，失去了传统社会资本的一些少数民族社会中，不仅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弱化了，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传统社会控制力的松弛导致的各种道德失范问题：诸如吸毒、盗窃、卖淫、斗殴等，由于传统的互助机制及网络的瓦解导致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滞后、在一些社会中生存能力的降低等，可以说今天农村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传统社会资本的流失或社会资本的不足有关系。在今天，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大以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变革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瓦解还将会加剧，各民族传统社会资本的流失也同样面临着加速的危险。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有益的社会资本发生流失的现象，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社会发展退步的表现，发展中社会资本的不足同样制约着不同民族的发展，不同少数民族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性制约着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种严峻的现实使得少数民族社会资本问题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发展中的社会资本建设也成为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在中国农村，不论是哪个民族，其社会都还处于一个没有结束的大转

^①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的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187页。

型过程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农村的现实，寻求新的发展思路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

笔者对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今天的发展过程，笔者既是一个研究者，也是这一个过程的亲历者。改革开放 30 年来，是各民族社会变迁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对于考察各民族社会资本的变化也是最有意义的。对不同民族而言，在其传统社会中都已经形成一套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机制，例如很多民族中都存在互助机制，这种互助机制体现在人们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紧密的关联关系中。在很多民族的社会中，一个家庭有红白喜事、建房或者是遇到灾祸的时候，全村人都要出力帮助，有孤寡老人没有子女赡养的时候，全村人都要尽义务。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家庭建房全村的人都要前来帮助，这点在过去可能由于劳动力的不足有一定的意义，而在目前很多农村中建房往往已经由外地人承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村子中的每个家庭仍然有人来参加，显示人们对传统的延续和重视。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往往采取集体协作的方式，通过互助来完成生产任务。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务，例如修路架桥、种植树木、宗教等集体活动全村人都有义务共同参与。尤其是一些大的生产性项目没有集体的协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云南红河流域哈尼族地区历史上修筑了数以百万亩计的梯田以及数万条灌溉水